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欧阳雪梅

[摘要]十八大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动下,明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路径,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努力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新生态的构建,注重文化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的作用,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得到全面拓展,表现出新特征、新气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关键词]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成果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09-0019-08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2011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八大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重视文化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和实现中国梦伟大征程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同年11月,他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2月31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2014年10月15日,他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以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等一系列的指导意见,在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中,文化建设出现了新特征、新气象,就是更加注重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2]方面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稳健,成果初现。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战略目标的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随着中国社会经

^{*} 本文系2015年度中央马工程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的项目成果。
作者: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需求增多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硬实力”显著增强,需要建立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

新中国一成立即明确了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两大任务。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谈到国家的现代化问题,首次把文化引入现代化的内涵中。他始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3](p.207,268)}但是,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新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是生存、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由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文化很大程度上需要服务于政治,因此,虽然在文化普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上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文化的功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邓小平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与建设目标,突出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但文化仍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反映的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处境。1997年,党的十五大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赋予了文化建设相对独立的地位与价值,而不再是配合性、辅助性的角色。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作用空前凸显。中共中央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4](p.29)}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和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发展问题,用“四个越来越”^①表达中共中央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并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命题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列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p.533)}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2014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2015年9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14日公布《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这些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更加清晰、路径更加明确。

二、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

“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是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并被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被提上日程。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逐步建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同年,新中国第一个文化发展五年专项规划《“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建设适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全民为服务对象的文化惠民工程

^①“四个越来越”即“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实施,包括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5项,按照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等原则构建,即满足人民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或基本文化需要。这被称为文化民生,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并建立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十一五”时期全国文化事业费共计1220亿元,年均增长19.3%。到2012年,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大为改善。

十八大后,主要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十二五”时期的前三年,文化事业费1594.03亿元,^①2014年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42.65元,大大超过“十一五”的投入。为促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中央财政安排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143.8亿元,补助地方文化项目的专项资金为46.53亿元,比上年增长0.72%;基层和西部地区文化单位的文化事业费总额在上升,县及县以下为291.32亿元,占49.9%,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了2.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提高了0.6个百分点。^②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提高服务效能,2014年3月,文化部牵头成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同年发布《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整体框架设计,为全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国家投入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令人瞩目:全国公共图书馆3117个,全年总流通人次53036万;群众文化机构44423个,全年组织各类活动147.20万场次;博物馆3658个,接待观

众71774万人次。^③出版各类报纸482亿份,各类期刊33亿册,图书79亿册(张);有线电视用户3.21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87亿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6%;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覆盖20户以上通电自然村,向户户通升级,直播卫星户户通已达1600多万户。^④农家书屋工程覆盖全部行政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了从国家中心、省、县级支中心,到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的服务网络,部分省(区、市)村级覆盖范围已延伸到自然村,建设有各级公共电子阅览室。

互联网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靠政府20年来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截至2014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6.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网民5.08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4.33亿,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微信公众账号数超过800万,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近5亿,网络文学用户数为2.94亿人。^⑤

目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需要继续增加投入。2012年以来,全国文化事业费虽然总量在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只有0.38%,20世纪90年代一度为0.62%。由于基础不一样,为实现各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协同共进,还需要健全财税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推进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区间的公共文化资源互补及资金互助,实现区域发展的基本平衡。总之,为加快现代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和保障机制,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手段,提升服务质量,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设,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

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丰富文化产品

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制约,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

①数据来自文化部财务司:《2015年中国文化统计手册》(内部资料),2015年5月,第4页。

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2月3日。

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同,政府统包统揽,造成了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而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各大歌舞厅为主体的经营性文化场所,形成最初的文化市场。随着中国入世的临近,在WTO框架中,国内习惯上一直被视为非经济的文化领域,大多都被定义为“产业”,要被纳入对外开放的范围;而且,原有文化体制下的文化生产难以适应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1998年,文化部增设文化产业司,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由市场和民间自发发展进入政府自觉推动新阶段。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将文化产业列入国家“十五”规划,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野,确认文化产品既具有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2001年10月,文化部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2009年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十八大吹响了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号角。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将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作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措施,提出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2014年上半年发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方向、规范。尤其是将文化产业界定了范围,明确为文化内容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生产服务和生产性文化服务四个类别,使文化产业跳出影视、出版、演艺等传统领域,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深度融合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等七大产业,文化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循环中。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门类齐全,呈成倍增长态势,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2.15%增加到2014年的3.77%,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日趋重要。截至2014年底,工商登记注册的文化企业达到168万多户,新增企业同比增长69.24%,达到39万多户。^[8]

2014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173.9万场,营业总收入226.46亿元;全国娱乐场所全年营业总收入1101.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6%。^{[6] (p.6-7)}全年生产电视剧429部15983集,电视动画片138496分钟;生产故事影片618部,科技、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40部,电影票房达到296亿元,其中票房过亿元的国产片36部。^[7]票房排在前10位的影片,国产片占7席。票房比2002年的8.6亿元增加34倍,连续10年复合增长率在30%以上。电视剧和图书出版年产量均高居全球第一,主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

国有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它来自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2015年,文化企业30强涵盖了文化艺术类、广播影视类、出版发行类、文化科技类、其他类五大类别,其中,文化艺术类4家、广播影视类9家、出版发行类10家、文化科技类4家、其他类3家。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22家,占总数的73%,比上届增加1家,主营收入、净资产、净利润、纳税总额主要经济指标均占本届“30强”企业相关指标总和的80%。^[9]

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2004年,文化部出台了《关于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次年,《国务院关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颁布,明确非公资本进入的具体领域。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很快,大多是中小企业。据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4月首次发布小微文化企业发展数据,2013年末,我国共有小微文化企业77.3万个,占全部文化企业的98.5%,营业收入为38306.8亿元,仅占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45.7%。61.8%的小微文化企业多汇集在服务业。^[10]但民营文化企业在一些行业成长很快,从事图书、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制作的民营投资主体逐步增多。2015年文化企业30强的文化科技类4家全部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新兴业态中表现突出。电影业80%的市场份额由民营主体占据,近10年来票房过亿元的国产大片大部分出自民营影视公司。2013年,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总票房就突破了30亿元,现在继续领跑电影行业。民营企业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中国文化产业与世界差距仍然很大。美

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是27%，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强国日本是20%，英国为11%。中国的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偏低，而且，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总量偏小，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低，初级文化产品多，在内容创意、产品创新、科技驱动和品牌塑造方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足，掌握关键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企业数量不多。随着网络、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动漫游戏、数字电影、网络视频、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公共视听载体、数字出版、手机出版等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拓宽了文化产业的领域；包括广告服务、建筑设计和专业设计在内的生产性文化服务前景广阔，骨干文化企业如何通过资源和规模优势带动小微企业发展，这些是使文化产业保持持久强劲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文化产业本质上属于“内容产业”，应围绕“精神”二字做文章。刚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强调国有文化企业在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的担当，明确了改革思路，以着力改变相当部分国有企业价值偏离、等靠政府、惰于创新、效能低下的问题。中国进入文化经济时代，还需要努力。

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

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培育。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开放，国门大开，西方的思想文化强势进入，极大地影响了人们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市场中产生的利益价值观念解构了中国传统观念，导致社会价值观离散化的负面效应，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及贪污腐败现象，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凝聚力。

中共中央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要求以德治国。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八大在此基础上提炼、概括出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倡导”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因为它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他要求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实践路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形成全社会向善、向上的力量。中央发布《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建设。与此同时，党中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国家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积极推进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领域诸多问题的解决，强调“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十八大以来被反复强调。1992年，李瑞环提出要使文化遗产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珍贵资料。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11] (p.572)} 2013年8月，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他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2]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因为其思想和理念,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引导国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9月24日,他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3]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是空前的。

文艺作品能够体现一个民族、国家、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极其重视文艺的这一功能。2014年10月,他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重申了“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期待他们“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14]使文艺能够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提供精神正能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2015年9月通过和发布了《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全面强调了文艺的服务群众与教育引领群众的功能,文艺应适应需求也要提高素养,明确文艺的认识、教育、娱乐、审美的功能,纠正那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否认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只承认文艺的娱乐功能,否认文艺的教育审美功能的偏向。《意见》要求文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并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要求把创

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程,做好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工作,大力发展网络文艺。这就充分肯定了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的文艺工作的地位,为多年的分歧划上句号。文艺界要承担起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崇高使命。

五、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但近代工业化以来,先是兴起了欧洲中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美国中心论,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美国主导下强化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普世性”宣传,非西方文化会与西方文化相对抗的“文化冲突论”喧嚣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将西方现代化模式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所谓“唯一模式”或“普世模式”还原为“一种模式”或“欧美模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但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与西方国家存在着重大差异,西方国家容易把中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和制度模式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不守规则论”不绝于耳,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严重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为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共识,增进信任和友谊,尤其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党的十五大把文化交流由原来的主要引进来,转变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而且符合目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为对抗美国文化贸易的一家独大,保护自己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产业的空间,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时提出经济全球化中“文化例外”的说法。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文化多样性”观念。2001、2005年,相接推出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中国文化走出去切合时机。

目前我国形成了政府与民间并举,文化交

流与文化贸易并重,“走出去”与“请进来”并行,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与97个国家签订了800多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进行文化交往,并在海外99个国家设有100多个使领馆文化处(组),已建成20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海外华文媒体分布在61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达1019家,其中报纸390家、杂志221家、广播电台81家、电视台77家、网站250家,已成为国际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5]互联网的发展有利于打破西方传媒的垄断,近些年中文内容已由以前的不足5%上升为12%。^[16]“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中国文化周”,在欧美各国举办,成为其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孔子学院举办10年,在全球五大洲126个国家和地区已有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在美国现已设立100所孔子学院和366个孔子课堂,267万美国民众参加孔子学院活动。^[17]中国的原创音乐、舞蹈、杂技精品和传统艺术纷纷走向国际市场,图书、电影、动漫、游戏“走出去”步伐坚实。据统计,2003年至2013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从60.9亿美元攀升至27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2%;文化服务进出口从10.5亿美元增长到95.6亿美元,年均增长24.7%。^[18]

为改变目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偏低现象,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提出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文化合作和竞争,把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19]“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思想,是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总体格局出发,统揽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新态势,贴近国际文化贸易的实际,不仅对我国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文化产业参与国际市场大循环、调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新生态的构建。近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人文交流机制,也搭建

平台积极发声,强调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呼吁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借鉴的重要性。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由联合国文明联盟举办全球文明对话论坛以来,我国成功举办了60多场文化高峰论坛与文化对话,阐述中国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发展理念,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释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不仅如此,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战略、以新型义利观为指导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战略理念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些新提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再次让世界感知到了充满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内涵,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在联合国预防腐败问题会议上,提交《中国的反腐败国家战略》等文件,中国还利用APEC峰会的主场优势,与成员国联合发布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世界广泛好评。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还亲自在国际交往中直接传播和塑造中国形象。2014年3月下旬,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指出: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0]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明确要求抛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主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驻外大使不断在《泰晤士报》等西方重要媒体发表文章,阐述中国的发展理念,对一些国家鼓吹“价值观外交”进行回应,公开驳斥抹黑中国的言论。中国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与传统的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冷战史观的高下立现,获得了不少国家的支持。一些学者和外国领导人呼吁不要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将惠及全球。法国汉学家雷米·马诺教授撰写的题为《牡丹鲜——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的著作,告诉西方读者:“当前的中国,是古老中国传统与主要来自西方影响的现代因素结合演变的结果。两种文明其实是走了一条相遇、相碰、冲突,

而后交合、融汇、学习与交流的道路——这是一条有助于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光明之道。”^[22]他认为,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各自实现自我完善是可能的。2014年6月16日,李克强在《泰晤士报》发表题为《中英正走在共赢的道路上》的署名文章,该报在头版配发了评论,呼应并肯定了文章表达的观点。但整体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掌握国际话语权、文化传播能力与经验等方面差距较大,需要有更坚定的文化自觉性,更强大的文化感染力,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从建设文化强国的角度看,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是一种基于核心价值观并通过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贸易、文化服务而实现的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体系,需要有强烈共鸣的共同价值观、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广泛的文化辐射力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中国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列宁曾说:“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那样迅速……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23](pp.197-19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逐步明确路径和步骤,开始把发展文化的愿景、计划落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如果能本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我国一定能在文化资源大国的基础上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 人民日报, 2013-08-21.
-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5-09-12.
-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2014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 [7] 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N]. 光明日报, 2015-06-09.
- [8] 孙志军. 积极推动文化企业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N]. 光明日报, 2015-02-03.
- [9] “中国文化企业30强”调查报告[N]. 光明日报, 2015-05-27.
- [10]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小微文化企业发展数据[N]. 人民日报, 2015-04-28.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2]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N]. 人民日报, 2014-02-26.
- [13]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9-25.
-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N]. 人民日报, 2014-10-16.
- [15] 何亚非. 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梦[J]. 求是, 2015, (1).
- [16] 姜飞. 新阶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性思考[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6).
- [17] 评孔子学院十周年: “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N]. 人民日报, 2014-12-09.
- [18] 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N]. 光明日报, 2014-03-19.
- [19]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4-03/25/c_126314187.htm.
- [20] 习近平.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N]. 光明日报, 2014-03-28.
- [21]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N]. 光明日报, 2014-05-23.
- [22] 雷米·马诺又. 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N]. 文汇报, 2013-05-23.
- [23]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美景

The Development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Its Nuclear Connotation: Under three-decade continual practices since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the theories and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have been taking shape and constantly been improving. In 1993, the renewing theory of “economic units with mixed ownership of assets” was put forward on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ensuring space for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In 1995, the report of the 15th NCCPC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otion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the theory was further improved, calibrated and renovated on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in 2013, which unveiled its nuclear connotation and the prospect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ublication of *A Guidance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2015 clarified the goals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Leng Zhao-song)

The Path from a Large Trading Country to a Trading Power: It was the influx of foreign capital that made China a large trading country in light of the status quo that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all over the world define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countries in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profi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China is bound to be relatively low. Intent on building up a trading power, we should transform from introducing factors to cultivating them, from the low-end to the high-end in the value chain, and from environment adaptation to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The theoretic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include analytical method for trade income, comparative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athway for upgrading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the role in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ategies, etc. The present mechanism and recognized rules that global economy follows is microcosmically based on the global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further advanc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for altering China’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nstructing a trading power, and define China’s development route so as to enrich economic theories.(Zhang You-wen)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Are People-Serv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ture and art of any kinds are bound to be the products of their specific times, taking the certain tasks of the age as their main tasks and fundamental basis. I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u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an ultimate principle that we follow for pinning down the pathway and making policie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Acknowledging the modern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to accept their basic goals and fundamental pathway conform to the time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unchanged contents in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dominate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remain other parts changeable with times and forming no contradiction to the dominant tune and gist in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Even the people-servingness as the main logic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has presented various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ts evolution constitutes the intrinsic development of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Lian Ying)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or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Country with Powerful Cultural Advantages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eadily advanc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powerful cultural advantages was made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overall layout for “Five-in-one” on the Eighteenth CPC Congress. The new central leaders collectively push forward clarifying the goal and pathway towards a socialist country with powerful cultural advantages, building up service system for modern mass culture, and advanc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fundamental mass culture service. Efforts are also made to plan and bala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to push forward rapi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t foundation and stressing the basic role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actively further the publicity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neo-eco system. Meanwhile, proper significance should be paid to the active roles of culture as it may uphold a spiritual banner, set up a spiritual pillar, and construct a spiritual homeland on the one hand; and carry forward Chinese virtues, disseminate Chinese values and cohere Chinese strength on the other hand. And we shoul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expand the scop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a full sense, presenting a whole new character and atmosphere, and taking a solid step in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uyang Xue-mei)

An Analysis of Advancing Equal Distribution in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thics in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thics,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private enterprises refers to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gains in line with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on factors which follows socially recognized moral rules and criteria as well as represents the co-sharing of whole staff members involved. It includ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income resources, the rationality of distribution rules and the justice of ultimate distribution. However, private enterprises’ obsession with maximized profits often distort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distribution and handicaps the compilation and practice of equal distribution rules, which leads to an excessive ga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seriously deviates the goal of justi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Equal distribution would not come into being unless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decide to choose and develop a sense of fairness as well as an internal system of fair distribution under the restraint of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Qiao Gui-xiang)

On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Social Creditability: A Posi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Groups: Social creditability belongs to a fundamental moral domain which gradually takes its shape after human society develops into a classed one. From a deep structure of ideology, the concept of honesty is a predominant value accepted as moral consciousness b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The notion not only impos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moral domain and figures, but also has cohered to become a fundamental symbol and core element for moral concepts in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opening up, the current social creditability are confront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attributable to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By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ith workers, peasants, civil servants and undergraduates, we attempt to map out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social creditability which covers government-directed mechanism, guarantee mechanism, network operation mechanism, mechanism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ransformative practice mechanism so as to propel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reditability.(Hu Xue-yan and Yin-Jie)

On Social Morality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 Market- and Cyber- Oriented Perspective: Since the end of Qing